

系统观统领下党纪教育的贯通协同策略

徐宁¹, 李娜²

1. 洛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洛阳 471934;

2. 朝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朝阳 122000;

摘要:党纪教育作为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举措,在实施进程中面临着考评机制不完善、监督体系不健全、新型形式主义滋生等实践难题。鉴于此,应以系统观念为引领,立足系统的整体性、关联性与差异性,聚焦党纪教育的长效建设,秉持“治未病”与“治已病”相融合的理念,精准发力、靶向施策,提升党纪教育入脑入心的实际成效。从党纪教育全过程考核评价、群众监督、纠治形式主义等维度探寻实现贯通协同的优化路径,在此基础上,完善系统动态调节机制,构建党纪教育贯通协同的长效保障体系。

关键词:系统观;党纪教育;全面从严治党;贯通协同;考核评价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6.05.005

文章编号:2096-9864(2026)05-0048-08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把“必须坚持系统观念”^{[1]10}作为“六个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之一。在系统观视域下,党纪教育贯通协同不仅是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重要抓手,还是强化党的自我革命、凝聚大党治理合力的有效路径。按照系统学说,系统是指“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2]。因此,党纪教育在思维方法上不仅要关注结构论,还要关注事物或组织的整体存在与构成要素的关系。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落实主题教育重点措施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次主题教育不划阶段、不分环节,要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等贯通起来,有机融合、一体推进。”^{[1]492}202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进一步指出要把正风肃纪反腐贯通起来。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与主题教育要求,为以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党纪教育,实现各项工作有机贯通、协同发力提供了科学指引与实践遵循。

一、新时代党纪教育贯通协同的实践难题与原因分析

在社会思潮相互交织、碰撞,互联网与数智技术深度融入社会各领域的新阶段,各类风险挑战相互叠加,党员干部所面临的“糖衣炮弹”式诱惑呈现出更为隐蔽复杂、尖锐严峻的态势,纪律防线遭受的冲击与挑战远超以往任何时期。在此背景下,党纪教育不仅是新时代党的

收稿日期:2026-04-08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系统廉政专题研究项目(2025 LZDZ-53)

作者简介:徐宁(1976—),女,河南省洛阳市人,洛阳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发展哲学研究;李娜(1979—),女,辽宁省朝阳市人,朝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建设的关键着力点,更是我们党保持大党独特优势、巩固长期执政基础的重要举措。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3][7]}新时代党纪教育在推进落实过程中面临诸多难题,集中体现为考评机制相对滞后,群众参与度相对较低,新技术应用引发了隐性形式主义三大实践难题,致使党纪教育的实际效能难以充分彰显。

1. 考评难题:过程性考评相对滞后

党纪考评对于党纪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导向作用,是影响党纪教育实效的重要制度因素。当前存在一些地方党纪考评相对滞后,各执行主体责任边界模糊、教育内容衔接配合欠佳,难以形成贯通协同的反馈机制的问题。同时,部分参与主体联动意识淡薄、协同机制缺失,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与浅表化特征。若任由此类问题持续,各类党纪教育载体将呈现分散态势,线上数智教育平台与线下培训、专题研讨、实地教学等将各自为政,难以有效融合。借鉴胡塞尔的主体间性理论,“先验的交互主体性就在交互主体中构造出了一个客观的世界”^[4]。在党纪教育协同推进的语境中,主体间性既体现为供给端、实施端与参与端等多主体的互动关联,也意味着不同主体间的联动与协同。党纪教育的考评体系还存在缺乏群众有效参与的问题,群众对党员干部党纪学习成效的直观感受与切身体验,长期难以纳入考核视野。事实上,党员干部的日常行为操守,是检验党纪教育落地成效最直观、最现实的体现。若党纪教育的过程性考核缺乏贯通协同、科学完善的评估机制,极易使考核流于表面、浮于形式,陷入学过即止、敷衍应付的形式主义误区,沦为流程式的“走过场”。长此以往,势必弱化党员干部对党纪教育的思想认同与敬畏之心,滋生轻视纪律、漠视规矩的错误倾向,致使党纪教育应有的警示震慑与

约束规范功能无法高效发挥。

2. 监督难题:群众参与度不足

党纪教育不能窄化为党员干部的内部教育,必须将外部监督尤其是群众监督纳入党纪教育的全流程。从当前实践来看,群众参与党纪教育监督还面临不少堵点:一方面,群众监督的参与度尚需提高,纪律教育成果向基层拓展、向群众普及的广度和深度仍显不足。部分党员干部把群众监督当作“走形式”,面对群众批评,态度推诿,刻意规避问题;另一方面,部分领导干部党纪意识淡薄,突出表现是日常党纪学习流于形式,在常态化党纪教育中忽视群众监督,导致群众对党员干部党纪学习的情况缺乏了解,党纪教育的成效难以有效评判。可见,部分党员干部热衷于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沉溺于“饭局文化”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现象,折射出的正是群众监督未能贯穿党纪教育全过程的实质。究其原因在于部分基层单位未能结合自身党纪教育开展实际,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群众评议机制,往往将群众评议窄化为笼统的满意度测评与量化积分考核。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时曾指出:“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5]群众对党员干部接受党纪教育后的实际作风评价,是党纪教育成效的重要检验标准之一,这一标准为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制度化提供了重要支撑。

3. 新型形式主义难题:技术依赖消解教育实效

“创新方法载体,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推动党员教育培训工作提质增效”^[6],这是适应新时代党纪教育效率的重要举措。在党纪教育实践推进过程中,数智技术的深度应用实现了海量党纪教学素材与资源的聚合,打破了传统党纪教育的时空壁垒,推动教育教学模式向灵

活化、优质化转型,为党纪教育的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注入了新动能。然而,在数智技术赋能党纪教育的实践进程中,仍存在诸多亟待破解的现实难题,导致教育实效未能充分释放。一方面,形式主义问题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部分党员干部为快速完成学习任务,采取在线直播截图、挂课不听课等敷衍行为,使得党纪学习沦为“走过场”“应付差事”的形式化操作,违背了数智技术赋能党纪教育的初衷。此外,数智技术工具依赖,容易掩盖党纪教育内在的党性关怀与情感温度,不利于党纪教育真正入脑入心。数智技术通过虚拟仿真、专家公开课、线上自主学习等形式开展党纪教育,虽然降低了教育成本、提升了传播效率,但也减少了面对面交流互动的真实感与现场感,弱化了党组织内部的情感联结。

二、系统观统领下党纪教育的优化原则与策略分析

作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手段,党纪教育不仅是锤炼党员干部纪律素养、筑牢思想防线的需要,而且是新时代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对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质量迭代升级的必然要求。从党员干部培育、纪律建设推进和教育实效转化的全流程看,系统观视域下党纪教育应遵循系统观念的整体性、关联性、差异性和动态性特征,贯通正风、肃纪、反腐全局,协同党纪教育各方,一体推进党纪教育基本内容。

1. 以系统的整体性总揽全局,破解考评难题

党纪教育首先要遵循系统的整体性,以系统观为引领,统筹推进正风教育、肃纪教育、反腐败教育,并将三者的内在要素有机衔接起来,实现党纪教育全覆盖,筑牢党纪教育的全域性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初心、担使命,

找差距、抓落实’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要全面把握,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3]524} 因此,要立足系统治理理念,打破“碎片化”教育壁垒,强化考评的过程性,构建务实管用的党纪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以科学评价倒逼党纪教育质效升级,以贯通协同的方式开展。

党纪教育是党员党性锻炼和修养的终身课题,不能简单机械地以量化打分方式进行考核。这种做法既忽视了党纪教育的过程性,也弱化了考核评价对党纪教育本身的长效赋能作用。完善党纪教育全过程考核评价体系,需要明确党纪教育全过程考核不应局限于理论学习、测试得分等刚性量化指标,更要突破单一化、机械化的评价局限,兼顾软性素养与日常品行的综合考察。依托民意测评,注重将党员干部单位言行表现与家庭家风状况一体纳入考评范畴,考察其在工作场景中的纪律自觉、作风状态,也考察其家风家教、家庭修养与私德品行。检视党员干部遵守党纪、践行规矩的全过程表现,通过动态化、常态化的群众口碑考评,构建党纪考评的全面指标。党纪考核本身也是党纪教育,能够倒逼作风提质增效,推动党纪教育方式创新。

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牵引,推动党纪教育有机贯通、同向发力,并将显绩与潜绩、虚绩与实绩的辩证考评贯穿全程,通过考核校准行为偏差、夯实教育成效。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谷文昌纪念馆时,作出向谷文昌学习的重要指示。谷文昌同志带领群众植树造林、根治风沙之患,以默默无闻的潜绩筑牢生态与民生根基,最终化为惠及长远、载入民心的不朽显绩。可见,潜绩与显绩并非绝对对立,二者皆属实绩范畴,均应纳入长效考核评价体系。潜绩致力于夯实基础,为显绩的达成奠定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赢得民心才是最为显著的显绩。部分党员干部为刻意营造“显绩”,

采取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数据注水等方式制造“虚绩”,对此必须通过精准考评严格甄别并坚决纠正。推动党纪教育向基层延伸、贴近群众,将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作为检验纪律作风成效的重要标准,完善显绩与潜绩、虚绩与实绩的全过程考评机制,以考核促进工作落实,以评价推动工作实效。开展党纪教育,必须秉持贯通协同的理念与方法,坚守人民立场,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严明的党规党纪保障为民初心,以实际工作成效赢得民心、凝聚力量。诚如毛泽东同志借用《愚公移山》寓言所阐明的道理: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来自人民群众,完成历史使命的重任如同“愚公移山”般需“挖山”不止,而“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挖山精神体现的正是一种潜绩精神。要发扬“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1]495}的精神,以价值引领减少违纪诱因,校准政绩观偏差。贯通协同教育与考评机制,使二者深度融合,有助于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处理显绩与潜绩、虚绩与实绩、当下与长远的关系,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考评业绩。

2. 以系统的关联性凝聚群众力量,破解监督难题

系统的关联性要求在思维方法上不仅要关注结构论,还要转向关注事物或组织整体存在中构成要素的关系。党纪教育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教育体系,无论是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各项纪律教育,还是党的其他学习任务,均需畅通群众参与渠道、吸纳群众监督力量、融入群众评价视角,凭借广泛多元的群众参与夯实党纪教育贯通协同的群众基础。从系统关联性视角来看,党纪教育并非局限于党内的封闭式专属教育,而是在党群互动过程中开展的开放性教育。群众作为外部监督主体,是衡量党纪教育实际成

效的关键指标。

家风连着党风,家教关乎作风,深入推进党纪教育,应当充分挖掘并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底蕴,以先辈典范涵养纪律自觉。譬如毛泽东坚持不搞特殊、周恩来订立十条家规等事例,生动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家风。要将优良的家风家训教育作为党纪教育的重要抓手,总结、交流并推广可复制的家教经验,为单位党组织开展党纪教育提供示范引领。同时,针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需坚持将家风教育与企业廉洁文化相协同,建立联动教育机制。还要在事后惩戒中强化党纪教育的震慑效应,明确新型腐败的党规党纪适用标准,对期权腐败、影子公司等行为形成警示,推动党纪教育从被动约束向主动预防转型,如创建“家风破防”“围猎陷阱”等虚拟场景的情境教学,充分依托党员干部家庭这一关键阵地,积极调动党员干部家属的参与积极性,引导家属主动投身党纪教育监督工作,发挥家属在日常监督、思想引导方面的独特作用。通过家属座谈、同事访谈、谈心谈话等方式综合研判教育成效。组织干部与家属共同研习中华优秀家风文化,活用“恋亲不为亲徇私”“莫用三爷,废职亡家”等传统治家典故,辅以正反典型案例警示教育,贯通家风家教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私德修养与政德锤炼,全方位织密纪律作风防护网。

党纪意识的养成并非仅靠单一的理论输入就能完成,要以党纪教育创新为抓手,切实凝聚党员思想共识、厚植组织认同根基。达成党纪教育预期成效的关键要素之一,还在于把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延伸至家庭末梢,常态化推进“家庭-单位”贯通协同教育。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提出了组织认同理论,认为“组织认同”本质上是个人与组织目标一致时形成的情感契合关系。回溯革命战争年代,党领导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采用的是一

种生活化的教育方式,通过口口传唱、写墙报、拉家常等方式,让党纪意识入脑入心、内外一致,实现纪律教育从纸张走向生活、从要求变成习惯、从内部评价转向群众认可。这一党心民意的情感契合是党纪教育的光辉典范。

3. 以系统的差异性丰富教育方式,破解新型形式主义难题

现代系统论认为,各子系统、各要素、各层级属于一个整体,也即总系统,这构成了系统的整体结构;结构决定功能,离开了总系统,各个组成部分则会丧失相应的功能。这要求党在党纪教育实践中,必须着眼于系统的关联性,理顺不同部门类别的结构关系,统筹协调各方力量,突破“大水漫灌”的教育模式,转向贯通各年龄段、职务级别与职业类型的差异化的“精准滴灌”式教育。

新媒体时代赋予了创新党纪教育方式的契机,但是也要注意“对新媒体,我们不能停留在管控上,必须参与进去、深入进去、运用起来”^[7]。从“有的放矢”方面着力,增强党员干部党纪意识。坚持把相关内容常态化、长效化推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实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形成新媒体的载体合力,创新新媒体时代党纪教育的方式,可从三方面着手:在党纪教育课程载体层面,可以更新党纪教育形式,比如鼓励单位“一把手”讲党课,以开直播、可互动的教育方式直面群众评议,纠治人文关怀弱化问题;在物质载体层面,可以盘活本土红色教育资源,根据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设计主题参观、情景体验式教学,避免千篇一律的游览式参观,让红色资源真正转化为党纪教育的鲜活教材,纠治新技术应用衍生的新型形式主义问题;在网络载体层面,可以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岗位层级的党员干部推送适配其认知习惯和思想需求的党纪教育内容,打破笼统统一的内容输出模式,贴合不同群体的思想特点定制教育模块,让党

纪教育内容从“大水漫灌”转为“精准滴灌”。三管齐下,合力推动党纪教育实现规范力度与人文温度的有机统一,切实彰显系统观统领下贯通协同的治理效能。

立足不同群体差异推进党纪教育精准落地,是破解新技术引发的新型形式主义、提升教育实效的关键举措。一方面要坚持分类分层、精准施策,以系统贯通、协同联动的思路,针对党员领导干部、普通党员等不同群体的思想认识水平与岗位履职特点,科学设计差异化的教育内容与教育形式。另一方面还要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形成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党纪的“头雁效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战争年代,喊一声‘跟我上’和吼一声‘给我上’一字之差,天壤之别。”^{[3]544}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应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主动开展自我反思与批评,以躬身践行的实际行动规避党纪教育中的技术依赖、人机互动不足等新型形式主义倾向。

在分类分层教育中,还需重视党纪教育的共通性整合,避免过度追求差异化而陷入碎片化、形式化误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象喻为全党的“共同语言”,始终强调党纪教育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根基,这一主张在延安整风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次党纪教育实践中均得到一以贯之的传承与落实。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上海法租界正式成立,作为发起组织,其相继推动了北京、武昌、日本、长沙、济南、巴黎等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青年毛泽东同志曾回忆,1920年阅读《共产党宣言》对其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重大引领作用。周恩来在赴法勤工俭学前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人的入门读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3]519}。党纪教育一大重

要方式就是要组织中青年党员定期开展专题研讨,分享认识、体会与举措,切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年轻干部学习原著的殷切期望,引导党员干部摆脱技术依赖,真正沉下心来阅读经典著作,从中领悟党纪内涵,从根本上纠治挂机学习等新型形式主义,实现分层教育与共通教育的协同推进。

三、健全系统动态调节机制,筑牢党纪教育贯通协同的长效保障机制

系统观念强调从系统整体层面认知并把握系统的动态性本质,完善系统动态调节机制,构建党纪教育贯通协同的长效保障机制。此动态性表现为,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演变,系统内部各要素及组成环节会进行适应性调整,且各类变化始终与内外信息输入、实践反馈输出密切相关。这就需要党纪教育主动适应形势发展变化,在动态调适、迭代完善过程中凝聚育人合力,稳步构建整体性、联动性、差异性的贯通协同的党纪教育工作格局。

1. 用典智慧与时代课题相结合贯通党纪教育内容、协同发力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先生提出要对中华文化抱持一种“醒觉”态度,在他看来,“墨氏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8]。当前,要推动党纪教育内容的古今贯通,就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着的治吏与修身等智慧中汲取营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求真精神,“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索意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德行大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以及“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情怀,等等。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对政德教育、修身方法、内观自省等的深刻阐释,

是涵养新时代党纪教育的重要文化土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纪教育中,经常性地引经据典教育党员干部,为党纪教育注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德思想。譬如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就借用了《论语》中“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的经典论述,提出了对党员干部的纪律要求。因此,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用典智慧与新时代党纪要求贯通起来开展党纪教育。

回顾百年党史,党纪教育始终能够抓住当时党建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整训原则,古田会议明确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方向,延安整风实现了全党在思想和政治上的空前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三反”运动为契机,开启了执政党作风建设的实践探索;进入新时代,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及党史学习教育,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这一系列举措一脉相承地体现了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坚定意志,也彰显了党纪教育紧跟时代步伐、回应时代命题的鲜明特征。党员干部通过学习贯通古今的“教材”,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党的创新理论的历史渊源,进而增强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

2. 日常教育和经常教育双向贯通,协同发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总结运用好经验好做法,坚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把党纪学习教育的成果持续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1]511}应突出日常教育,把党纪转化为干部的自觉行动。日常党纪教育包含将政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两个过程:党纪教育融入日常,重在理论灌输、思想浸润,实现内化过程。通过强化理论之训

奠定思想基础。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東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9]党纪教育是深化自我革命、严明纪律规矩的关键路径。早在1941年7月,中共中央就出台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将党性锤炼与纪律教育置于突出位置,以刚性要求强化党员的斗争意识与政治定力。从党性教育的全过程来看,从追求入党到组织上入党,再到成长为思想、政治成熟的党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锻炼和修养过程。这一过程是从不知到知、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从现象认知到本质认知,从内化于心到外化于行的逐步深化过程。党纪教育能否取得实效,关键在于党员是否具有自觉性,是否真心接受党的培养教育,是否愿意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改造主观世界。有了“融入日常”的理论素养基础,结合“抓在经常”这一外化过程,才能实现人的行为自省,达到党纪教育的效果。

当前,在常态化党纪教育方式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一是在自然“融入日常”的学习和“抓在经常”的实践上还存在结合不紧密、重形式轻内容的问题。为此,在问题查摆环节,要收集群众对党纪学习方式提出的合理化意见。同时,依托线上便民平台、线下意见征集点邀请党员畅谈最不喜欢的党纪教育方式。敦促党员干部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形成“知敬畏、存戒惧”的思想自觉。党纪教育不应止步于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是什么”照本宣科地讲解出来,更不能只停留在讲明“是什么”的初级阶段,而要围绕“为什么”“怎么做”展开更深层次的分析与引导。“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

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10]形式主义是基层治理中“不善为”的典型体现。在开展党纪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留痕摆拍等形式主义行为,本质上是将党纪日常教育矮化为日常打卡行为,把党纪教育的实质内容丢置一边,进而割裂了日常教育与经常教育在内容上的双向贯通与协同联动。

四、结语

党纪教育本质上是为党员干部塑造正确价值立场与纪律认知的预防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进内外治理实践、筑牢思想根基的重要载体,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精神支撑。党纪教育聚焦党员潜在的思想偏差与行为风险,开展前置性引导,着力“治未病”,防微杜渐;在此基础上,又兼具警示惩戒功能,强化“治已病”,矫正偏差。因此,必须以系统观念明晰党纪教育本身是由多元主体教育对象、教育内容与载体等共同构成的教育系统,其中各子系统间以及诸要素之间相互支撑、相互交融。面对时代发展进程中不断出现的党纪教育实践的难题,可通过整合家风教育与单位风气教育、正风肃纪教育与反腐教育、自我教育与他人教育、分层分众教育等多种教育形式,增强各级党员干部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11]党纪教育只有触碰到党员干部的内心深处,才能激起党纪意识。基于“贯通协同方式”的党纪教育创新,必将激活中国共产党人严明党纪的为民初心,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认同与思想共识,赢得人民群众衷心拥护,从而推动党纪教育在新时代持续走深走实。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2] 钱学森等. 论系统工程[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10.

[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4] 胡塞尔. 笛卡尔式的沉思[M]. 张廷国,译.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147.

[5]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6.

[6] 中共中央办公厅. 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2024—2028年)[N]. 人民日报,2025-02-28(6).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46.

[8] 任建树.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9] 列宁. 列宁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25.

[10]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00.

[11]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1.

[责任编辑:王天笑]



引用格式:徐宁,李娜. 系统观统领下党纪教育的贯通协同策略[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7(5):48-55.

(上接第47页)

[26] 漆程成,邱琪昕. 以“条块结合”破解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分割”困境:基于北京市“吹哨报到”改革的案例分析[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2(3):84-91.

[27] 中共中央组织部. 坚持改革创新 服务科学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组织工作的进步历程(2002—2012)[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80.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29.

[29] 汤彬,王浦劬. 属地化治理与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J]. 中国社会科学,2025(6):128-147,207.

[30] 唐兴军. 耦合与超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机制创新与效能提升[J]. 南京社会科学,2024(7):27-37.

[3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9:181.

[32] 宋清华,郑琳琳,陈奕景. 党委领导与企业ESG表现:基于“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视角[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25,16(1):108-138.

[33] 房爱卿,陈进行,赵长茂,等. 党建引领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济南实践[J]. 人民论坛,2025

(1):88-91.

[34] 孙肖远. 区域化党建创新逻辑与行动策略:以引领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为视角[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4(12):18-25,129.

[35] 习近平. 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 旗帜,2019(11):5-8.

[36] 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23.

[37] 吴新叶,吕培进. 在“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之间:基层党建联盟的活力空间[J]. 学术界,2021(7):83-94.

[38] 孟庆瑜. 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政策法律问题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68.

[39] 本书编写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48.

[责任编辑:王天笑 聂海杰]



引用格式:吴根甫,胡宜霖. 新时代加强“三新”党建的现实困境与纾解路径[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7(5):38-47,55.